

读者登场:翻译研究的轨迹和内涵

刘小林, 饶 萍, 郑晓慧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在深入研究各学派翻译理论之后发现,就实质和内涵而言,翻译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源文作者、原文、源语文化为中心的历史阶段;以译者为中心、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历史阶段;以读者、译本、译入语文化等为中心的、方兴未艾的历史阶段,此时读者已经取得了和源文作者、译者至少平等的地位。此翻译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彰显了翻译行为的本质所在——翻译即是为了满足读者、接受语文化系统等需求,将一种语言符号转变为另一种语言符号的特定行为。

关键词: 翻译研究; 源文作者; 译者; 读者; 译论学派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0 引 言

翻译理论的发展源远流长,在西方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相关论述。而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始终没能跳出经验论的窠臼,关注的只是“怎么译”。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呈现出了翻译理论发展的繁荣场面,涌现出了一系列的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其主要流派分别有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翻译研究文化学派、功能翻译理论,还出现了解构主义理论、当代阐释学理论、后殖民理论、功能学派翻译理论等等,其繁荣景象不一而足。而在中国,笔译则始于先秦时期的诗歌翻译,也出现了互有联系、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如“三美”、“化境”、“信达雅”、“神似”翻译三原则等等。研究世界翻译理论的发展历史和轨迹,有助于认识其实质和规律,并把握其发展的未来趋向。

1 翻译理论发展的主要流派和轨迹

在西方主要翻译理论流派中,翻译研究语言学派以语言学为出发点,代表人物有尤金·奈达(Eugene Nida)、纽马克(Peter Newmark)、卡特福德(J. C. Catford)、哈蒂姆(Hatim)、雅科布逊(Roman Jakobson)等,他们已经跳出了“怎么译”的经验论窠臼,从语言学的立场出发,运用语言学的相关视角观点执行翻译研究,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翻译研究层面。其最重要代表人物尤金·奈达于1947年发表《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标志着西方语言学派开始对翻译进行“科学”的研究。他著作甚丰,提出“翻译的科学”概念,倡导建立“翻译科学”,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角度提出了“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他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等值类型: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翻译的标准应该是“接受者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和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存在的关系相同”^[1]。需要强调的是,奈达指的并非是一种完全的相同,而是前者关系向后者关系的无限靠拢或接近。其代表作品有《翻译科学探讨》(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1964)、《翻译理论与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1969, 合著)、《语言结构与翻译》(Language Structure and Translation: Essays by Eugene Nida, 1975)等等。雅科布逊则将翻译分为三类,即: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2]。认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是用其他某种语言的完整信息来取代原文信息,而不是使用分离的符号单元。”

功能派翻译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凯瑟琳娜·莱斯(Reiss,2000),她于1971年出版了《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把功能范畴引入翻译批评,把语言功能、语篇类型和翻译策略结合起来,提出了以源文与译文功能关系为基础的翻译批评模式,创造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3]。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试图弥合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脱离,提出了目的论(skopos theory),将翻译从原文中心论的制约中解放出来^[4]。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目标语转向推翻了原文的权威地位,使得译者摆脱了等值理论的羁绊(Vermeer,2000)。

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从文化层面切入翻译研究(20世纪70年代始),代表人物有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图里(Gideon Toury)等。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美籍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等共同构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学派并作出了决定性贡献^[5]。该学派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作为译入语文学系统的组成部分,采用描述性的研究模式,开始强调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代表作品有霍尔姆斯于1972发表的《翻译学的名与实》(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6],图里的《翻译理论研究》(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7]和《描述翻译学及其外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Toury,1985),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等。

此外,解构学派翻译理论强调消解传统的翻译忠实观点,突出译者的中心地位。比如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就以解构主义的方法从政治、权力等角度探究翻译的问题和策略,反抗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霸权,提出了异化翻译策略,以便使更多异域文化成分得以进入译语文化。

而在中国,同样也出现了一些有着一定影响的翻译理论。许渊冲于1978年提出了“三美论”:诗歌翻译不仅要传达原诗的意美,还要尽可能传达它的音美和形美。钱钟书于1964年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化境”: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流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留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以进入“化境”。严复(1898)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最为著名,认为翻译要达到“忠实、通顺、高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开始了对翻译中文化问题的研究。但是,当时研究的仅仅是一般文化差异以及文化词语的处理,而对更加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2 世界翻译理论发展的实质和读者登场

通过研究世界翻译理论发展的现象和轨迹,从其内涵和实质进行划分,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源作、源语文化、源文作者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译者、译入语文化、译语文本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以及方兴未艾的第三个阶段,即读者、译品用途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并非泾渭分明,在某些时间是交叉进行的,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总体上呈现的是上述三个阶段顺时间的发展态势。

2.1 作者登场

在笔者看来,从翻译研究历史开始以来,一直到语言学派、信达雅、三美等翻译理论的出现,都属于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在该阶段,源语文本〔或“原文”(ST)、元文本(metatext)、源作(original)、源语文化(source culture)〕,或者原作者〔或发起者(initiator)、源出者(originator/sender)、赞助人(patronage)〕等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它们是一切翻译行为的发起者和出发点,也决定着翻译的方式、实质、进展等任何环节,是批判翻译的首要标准。此阶段代表性的译论有国内的“信达雅”、“三美”、“形似”,以及国外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等。

语言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奈达,他除了最先提出“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之外,对翻译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提出了对等原则,分别有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1]。形式对等以原文为中心,尽可能地显示出原文信息的形式和内容;动态对等则着重接受者的反应,而不完全集中于原文的信息。他认为翻译的标准就是“接受者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和源语接受者和源文信息之间存在的关系相同”。雅科布逊给出的翻译定义为“从一种语言到另外一种语言的翻译是用其他某种语言的完整信息来取代原文信息,而不是使用分离的符号单元。”他提出的三种类型的翻译: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影响极为深远^[2]。语言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纽马克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概念,交际翻译产生的效果力求接近原文文本,而语义翻译则在目标语结构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准确再现原文意义和语境。卡特福德则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Catford, 1959)中,将翻译界定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认为等值是翻译研究和实践的中心问题^[8]。从上述各位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的理论思想阐述中可见,他们大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提出或崇尚“等值”的概念,而这样的等值概念,无论是从实质和内涵上,都反映出了这样的理念:源文、源文信息,包括文化信息、背景等,是一切翻译行为的核心和出发点,译者、读者、译文都只是为源文和源语作者服务。源文和源语作者是衡量翻译的最重要的标准,一切翻译行为应该围绕这样的标准展开。

在国内,翻译理论“三美”认为,翻译首先要达到的目标便是传达源语的意美,然后是源语的音美和形美。“信达雅”更是将“信”即忠实于原文置于首要的地位,而“通顺、高雅”则是次一级的标准。传统译论“形似”主张译文和原文应该在形态、结构、排列、辞格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

2.2 译者登场

翻译理论继续向前发展,到了宏观意义上的第二阶段,即译者、译入语文化、译语文本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在笔者看来,此阶段的翻译理论重心已经从源文作者、源语转向了翻译行为的执行者——译者,以及影响译者的诸多因素,如译入语文化、历史、人文等,以及翻译行为的最终产物——译语文本或译品。此阶段的代表性理论有解构学派翻译理论,以及道格拉斯·鲁宾逊著的《译者登场》(*The Translator's Turn*)等。

解构学派翻译理论强调消解传统译论的翻译忠实观,突出译者的中心地位,从而为当代翻译研究开拓了新视野。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创作了“译者的任务”。在其序言中,本雅明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翻译思想表达了怀疑,认为译文和源文无“忠实”可言。译作不是去复制或传递源作的意义,而是与源作的一种和谐,是对源作语言的补充^[9]。这种观点消解了传统译论中译作与源作的二元对立关系,打破了源作的权威地位,将译作从次等、屈从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对后来的解构学派思想家颇有启发。解构学派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美国学者韦努蒂则在重新认识翻译中的不平等关系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自己抵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他反对译者的风格过于流畅,这样做会掩盖源文文本混杂性的本质,抹杀源文和译文的转换性和政治性。他主张“忠实”于源文的语调和语旨,“滥用”译语文化的文学规范,从而使更多的异域文化成分进入译语文化。

道格拉斯·鲁宾逊在其第一部翻译著作《译者登场》(*The Translator's Turn*)中,批判西方的翻译研究长久以来受到理性主义压制,没有深入到翻译实质和实际的事实,解构西方主流翻译理论背后隐藏的理性主义哲学概念(Logos),颠覆长期以来译者与作者、读者的关系,把研究焦点和出发点回归“人”本身,重视译者在翻译中的主观能动性、经受的影响和制约,宣扬作者、译者、读者双层面的平等对话机制,力图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10]。

翻译理论发展历史上的第二阶段可称为“破冰”阶段——打破源文、源文作者和源语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坚冰”,将理论研究的重点和出发点推进到了译者、译语文化以及影响翻译行为的诸多历史、文化、环境等因素上。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研究历史以来最具影响的忠实原则表达了根本性的怀疑,认为因为不可译性、文化因素、人为因素等的存在,译文无法“忠实”或“等值”于源文,无法完整地传达源文的信息和结构,只能是延续源文的信息,对源文起着补充的作用。那么,译者、翻译手段和方式、译语文化等便扮演了翻译理论研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韦努蒂便是出于这样的初衷,提出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与同化策略截然相反,异化策略强调的是译语文化比源语文化更重要,源语文化应该服从译语文化,从而可起到丰富文化、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作用。道格拉斯·鲁宾逊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译者登场”,宣扬源文作者、译者、读者是平等的。从译文接受程度上来说,因为文化差异、民族历史特性等因素的影响,译者甚至扮演了比源文作者更为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这是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2.3 读者登场

译者登场后,译论发展历史进入了第三阶段,研究重点从源语作者、译者转向了译语接受者——读者、委托人(commissioner)以及译品的用途和功效。在此阶段出现了一系列的译论,代表性的有功能学派翻译理论、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等。莱斯就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是在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等方面,译文

和源文都能取得一致。然而在实践中,等值是不可能实现的,故应该首先考虑译本的功能特征,而非对等原则。汉斯·弗米尔提出的目的论影响深远,此理论认为,在翻译行为所必须遵循的诸多法则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4]。源文的中心地位被瓦解,“对等”不再是批判翻译的标准,批判翻译的标准为译文实现预期目标的充分性(adequacy)。在实践中,以翻译委任(commission)来下达翻译目标和要求,而译者则根据此目标和要求采取相应的翻译方式和手段。克里斯汀娜·诺德(Christiane Nord)在其著作《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1997)中提出了“功能加忠诚”的翻译指导原则,但此“忠诚”仅仅是道德意义上的,只是关注翻译行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1]。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涉及的主要是文学翻译,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勒菲弗尔曾得出这样的结论:“翻译不是意义上的对等,而是两种文学观念的妥协,其中,接受系统的文学观念发挥了主要作用。”接受系统的主体无疑是文学作品读者,换言之,读者发挥了比源语作者更重要的作用。文化学派的多元系统理论强调文本在目的语境中的命运,源文文本地位的问题可以置于一边。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都是权力关系和文本生产。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实践者都认识到理解文本生产的操纵过程的重要性。

翻译理论发展至此,其重点和出发点已经从源文作者发展到译者,然后完全落到了读者和译品功能身上。功能学派的目的论就认为翻译目的决定其他任何翻译行为和环节。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译者执行翻译行为的目的当然是为读者服务,为目标语接受系统服务,为翻译委托人服务。或许,译文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忠实”于源文,但这已经不是考虑的首要问题。译文是否很好地实现了预期的目的,是否很好地服务了目标语读者,这才是判断翻译成功与否的首要准则。译者从委托人处接受翻译任务,考察接受系统的文化、民族特性、历史等可能影响译文接受程度的因素,或在功能方面,或在信息方面,或在功能加信息方面,生产出译语文本,为读者提供信息或功能服务,这就是翻译行为的本质所在。

综上所述,就研究焦点和侧重点而言,翻译理论研究历史已经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读者已经闪亮登场,并且处于舞台中央位置的聚光灯下。从翻译理论研究角度来说,与传统意义相反,读者不再是从属于源文作者和译者的被动接受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读者支配着源语作者和翻译行为的执行者及中介——译者,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翻译理论研究越来越多地侧重于文化因素、意识形态、接受系统的文化转向,而非源语文化、影响译者自身的文化因素。接受系统的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就是读者“消费”译文时所处的氛围和环境。研究文化转向和意识形态因素,只是为了使译文产生更好的接受效果,更好地为译文的最终消费者——读者服务。在生产和影响译文消费的诸多因素中,人究竟是根本性因素,是读者生产和影响着接受系统的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所以读者才是一切翻译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读者决定着翻译行为的一切因素与环节。这样的一种思想或许可称为翻译行为读者中心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翻译理论研究已经步入了第三阶段,研究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了文化层面及一切翻译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服务对象——读者,此阶段的理论发展依然方兴未艾,还不够完备和深入。换言之,一些理论只是从实质和内涵上触及了译论发展第三阶段的核心,却并未旗帜鲜明地喊出“读者登场”的口号。

3 结 语

翻译研究的实质和内涵从以源语作者为中心,转移向以译者为中心,最后转向以读者为中心,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必然,也是回归翻译的原初主旨和使命。翻译行为不能以源语作者为中心,因为源语作者只是信息的发出者,是翻译行为的原点和出发点;翻译行为不能以译者为中心,译者承担的只是信使的使命,将信息和文化从源语作者手中接过,然后传递给后来者——读者;翻译行为只能以读者为中心。翻译从业者和翻译研究学者们履行翻译行为、执行翻译研究,目的都只是为了产出更好的译品,从而为译入语的中心和主体——读者服务。另外,翻译理论家们也不必言必称理论指导实践。而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不仅已经跳出了“怎么译”的桎梏,还发展到了从多学科、多维度的角度,联系翻译中的文化层面,分别展开了“指令性研究”(prescriptive study)和“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12]。前者即为通常所说的可以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研究,后者指的是“描述、解释、理解翻译家所做的事,而不是去规定翻译家该怎么做”。从这个意义上说,译学观念的现代化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 [1] Nida E. 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M]//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26-140.
- [2] Jakobson R.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M]//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26-140.
- [3] Reiss K. Type, 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Decision Making in Translation[M]//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60-171.
- [4] Vermeer H.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M]//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21-232.
- [5] Bassnett S.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M]//Bassnett S,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23-140.
- [6] Holmes J.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M]//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72-183.
- [7] Toury G. A Rational for Descriptive Translation[M]//Venuti L.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o Hermans, Beckenham, Croom Helm Ltd, 1985: 16-39.
- [8] Catford J C. Translation Shifts[M]//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41-147.
- [9] Benjamin W.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M]//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5-23.
- [10] Robinson D. The Translator's Tur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11] Nord C. Skopos, Loyalty and Translational Conventions[J]//Target, 1991, 23(1): 91-109.
- [12] Chesterman, Andrew, Wager E.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 [M]. Manchester, UK & Northampton, MA: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The Reader's Turn: Trend and Essenc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IU Xiao-lin, RAO Ping, ZHENG Xiao-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exercises a profound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worldwide translation theory studies, and makes a discovery th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ts essence and implication, it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historic period when metatext author, metatext, original culture etc, dominate; the historic period when translator, translato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etc, dominate; the historic period when reader, target text, target culture, etc, dominate. This rule, translation studies follows in its development, illustrates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action, that is, translation i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readers and target culture system, and put source text into target text.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metatext author; translator; reader; various schools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责任编辑:马春晓)